

“卓然独立，上下求索” 極端的文學觀念

“卓然独立，上下求索” ——论苏轼的文学追求

“卓然独立，上下求索” Su Shi's Literature Ideology

李晓洁¹

บทคัดย่อ: ชูชี้คือหనี่ในผู้มีเอกลักษณ์บนเวทีวรรณกรรมของสมัยซ่งเห็นอ เป็นตัวแทน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สูงสุดของวรรณคดีสมัยซ่ง ชื่อ 诗 (เทียบได้กับกลอน) ของเขางานท่อ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ชิงปรัชญาเป็นหลัก ชื่อของเขาก็นำมาเรียกร่วมกับนักประพันธ์อีกท่านคือหวงถิงเจียน ว่า ชูหวง ส่วนสือ 词 (เทียบได้กับกลอน) เขาระพันธ์ด้วยชุดคำที่ “เพราเสนาหู” ถือ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ของสำนักหัวฟาง สำหรับความเรียง 文 “เนื้อห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คิดทั่วมหัน” “หลังให้ ออกมานี้ขาดสาย” จ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แปดสำนักโดยดังดังของสมัยถังและซ่ง ชื่อ สือ และเหวินของเข้า “มีเอกลักษณ์” โดยแท้ การแสวงหาวรรณคดีที่มี “เอกลักษณ์” ทำให้ชูชี้ สร้างสรรค์มุ่งมองที่แปลงใหม่ในทางวรรณคดี ความโดดเด่นของวรรณคดีก็มีจากลักษณะนิสัยจำเพาะของเขานั้นเอง บุคลิกเฉพาะตัวที่โดดเด่นเหนือผู้อื่นและการมีจิตใจที่จะชวนชาว亚 หาความรู้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ทำให้ชูชี้มีแนวคิดของตนที่ว่า “ไม่ศึกษางานสำคัญของสมัยนั้น” แต่ต้องกล้าคิดสร้างสรรค์ ตลอดชีวิตเข้าต้อง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ยากลำบากท่ามกลางการต่อสู้ระหว่างกลุ่มการเมืองเก่าและใหม่ แต่เขาก็ยังยืนหยัดในจุดยืนของตัวเอง ไม่พัดตามกระแสคลื่นของสังคม 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ด้านวรรณคดีของชูชี้คือภาพแสดงถึง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ที่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ห้เห็นถึงผลงานอันมาสติปัญญาความรู้ภายในที่สั่งสมมาตลอดชีวิตของเขาย่างชัดเจน

¹ ดร. หลี่เสี่ยวเจี้ย รอง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ด้านวรรณคดีจีนแห่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วเฉียว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李晓洁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文学，研究方向：文艺学。

Li Xiaojie,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Huaqiao University, P.R. China

คำสำคัญ: การแสวงหาด้านวรรณคดี เอกลักษณ์ ความคิดสร้างสรรค์ บุคลิกเฉพาะ การดำเนิน
อยู่ร่วมกับนวนิยายต่าง

摘要: 苏轼在北宋文坛上独树一帜，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的诗以理趣胜，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一改委婉缠绵词风，开创豪放一派；文“如万斛泉源”，“滔滔汩汩”，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其诗、其词、其文“自是一家”。“自是一家”的文学追求使苏轼创造了文学奇观，而文学的独创又源于其独立人格。卓然独立的人格，上下求索的精神，使苏轼科举“不学时文”，敢于创新；一生在新旧党争中历尽坎坷，却能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苏轼的文学成就是他一生内蕴才华见识的外在的综合显现。

关键词: 文学追求；自是一家；独创精神；独立人格；不同而并立

Abstract: Su Shi is the unique novelis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His Tang shi (like a poem) principally focus on philosophy, and with the another one novelist Huang Tingjian , people called them as Su Huang; Song ci (like a poem) word changed to more melodic and gentle satire, and that time he founded a Haofang school; the text “Plenty of detail and idia”, “creating the workpieces continually” that time he reached to the one of the eight most famous school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His Tang shi, Song ci and text are "Individuality." "Individuality" literary makes Su Shi created a literary marvel, and the original of his literature due to his personality. With the personality, the spirit of the learning, make Su Shi not admire with "the masterpiece of

tha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he dare to innovate. He was very suffer ia all of his life,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of political conception, but he still insist on self- concept. Su Shi's literary achievement is the external presentation of his life intrinsic talent insight.

Keawords: The Literary pursuit; Individuality; creative spirit; personality; Existence together on a difference

苏轼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个全才，他的诗以理趣胜，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一改委婉缠绵词风，开创豪放一派；文“如万斛泉源”，“滔滔汩汩”，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其诗、其词、其文“自是一家”，在北宋文坛上独树一帜，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一、创新：“自是一家”的文学追求

清代文学家李调元曾说：“余雅不好宋诗，而独爱东坡。以其诗声如钟吕，气若江河；不失于腐，亦不失于郛。由其天分高，学力厚，故纵笔所之，无不精警动人。不特在宋无此一家手笔，即置之唐人中，亦无此一家手笔也。”¹宋诗不可爱，是因为诗歌在唐代已经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宋代诗人在唐诗的辉煌笼罩下失去了自我。宋代最有名的江西诗派，也不过是化用前人的诗句做所谓“点石成金”的翻新。然而这种“翻新”究竟不是“创新”，正像黄庭坚自己的诗句所说的那样“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²。李调元不好宋诗却独爱东坡，是因为东坡的诗不论在宋代还是在唐

¹ [清]李调元：《雨村诗话》，《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 年，第 1396 页。

² [宋]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249 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代都可称得上“无此一家手笔”。他不是追随在唐人之后求点石成金，求超越；而是另起炉灶，求不同，求并立，求的是用“自是一家”的独特风格和唐人并列。“自是一家”是苏轼始终的文学追求。

我们经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要想成为一代文学必须创新，文人要想成为一代文学家也必须创新。创新使苏轼的诗在唐诗的光辉下仍能闪耀出自己独特的光彩，但他更具光彩的创新是他独具豪放色彩的词。诗歌到唐代已经发展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面对着唐人的成就，宋人只能另辟蹊径，创造出了代表一代的文学——宋词。然而词刚出现时，只是“诗余”，是茶余饭后的浅斟低唱，是花前月下的纵情消遣。传统观念中“词是艳科”，难登大雅之堂，重大政治题材只能入诗，不能入词。虽经柳永扩大了题材，但篇篇不出“羁旅悲怨之辞，闺帏淫蝶之语”（毛晋：《乐章集跋》），仍没摆脱抒发个人的离愁别绪、怀才不遇的狭窄题材的束缚，并且词的风格是委婉缠绵的。在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柔媚绮艳词风笼罩下，苏轼却唱出了“铜喉铁板”的不谐音，“新天下人耳目”。他冲破一切传统观念，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一切题材无不可入词，更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豪放”词。文学的创新是伟大的，但常常会是寂寞的，难以被当时的人所认同。苏轼虽然在当时就名满天下，但人们称许的是他的才华，却指责他的创新是“非本色”。当时的本色是“婉约”，人们对他独具豪放风格的创新不但不能欣赏，还颇有微词，“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陈师道：《后山诗话》）。《吹剑录》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

七？”对曰：“柳郎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人们习惯看到的是在酒席宴间，风姿万千的少女唱着婉约缠绵的艳词，突然改成关西大汉手拿铜琵琶唱出震耳欲聋的雄音，颇有点不伦不类，所以幕士此说内中颇含揶揄。然而“非本色”，正道出了苏轼独特的风格，也正是苏轼的追求。他听了幕士的揶揄非但没有生气，反倒“为之绝倒”。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做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¹“非本色”的创新使他非常自得。苏轼也写过具有婉约风格的词，即使同为婉约风格，他也绝不同于其他婉约词人。“人谓东坡长短句，不工媚词，少谐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缚而然。间作媚词，却洗尽铅华，非少游嬾语所及。”²苏轼夺人之处在于他不依附前人，不依附传统，他的大志是“自成一家”，与前人分庭抗礼，不肯亦步亦趋步人后尘。这正是当代否定主义理论所推崇的“不同而并立”的文学追求。

二、独立人格：独创精神之源

独创是一种文学追求，更是一种人生追求。在这种追求不同而“自是一家”的文学追求的背后，是苏轼标新立异的人生追求，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他不因循旧制，敢于创新。参加科举他“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³，深受文坛革新领袖欧阳修赏识，一举及第，名震文坛。他的著名游记

¹ [宋]苏轼：《苏轼文集·与鲜于子骏》，中华书局1986年，第1560页。

² [清]李调元：《雨村词话》，《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1397—1398页。

³ [宋]苏轼：《苏轼文集·谢梅龙图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5页。

《游石钟山记》更突出地体现了这样一种求索精神。前人已经对石钟山的命名有了解释，可苏轼不肯轻信而产生质疑，他要“夜泊绝壁之下”亲自探寻，当他听到“有竊坎鎧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自认为找到了石钟山命名的原因，颇为自得，于是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这是一种站在巨人肩上，看到更远的一种骄傲。虽然经后人考察苏轼的说法也不正确，但这种不唯前人，大胆质疑的精神却被后人推崇。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在新党旧党的倾轧中屡遭贬谪，其妾朝云说他是“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然而这“不合时宜”正透视出他不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己见的品格。苏辙曾评价其兄：“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¹宦海沉浮，并非苏轼堪不破世情，“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苏轼坚持的是卓然独立的人格，是上下求索的精神。无论是反对新法，还是否定旧法，都因为苏轼切身看到了新法与旧法存在的弊端，远见卓识与求实的勇气使他不能趋利避害。建国以来文学史评价苏轼，大都认为其政治上是保守的，反对王安石变法成其政治生涯中的污点。有人认为“他（苏轼）所处的中等地主阶层的地位，不愿意过多地触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他三十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的是书房生活，对当时社会因豪强兼并而引起的危机远没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尤其反对急进的措施。当神宗初年王安石实行打击豪强地主的新法时，他就上书反对。”²刘继才《唐宋诗词论稿》也

¹ [宋]苏辙：《苏辙集·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1页。

²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2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持此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但贬多褒少，何以建国后口径一致，大为其翻案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既然王安石变法是进步的已成定论，那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轼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保守派。作为教科书的历史如是写，文学史也如是说。

历史虽已成为历史，但人非文在，还不难考察出历史的真面目。一个在文学上敢于与前人分庭抗礼、不肯亦步亦趋步人后尘的人，何以在政治上僵化保守呢？游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其出身决定他不愿触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二是长期书斋生活使他看不清危机。然而仔细分析，这原因就有些经不住推敲。

苏轼、王安石都出身于清寒地主家庭，两人属同一阶层而坚持不同主张，显然出身不是导致二人政见不同的主要原因。更何况苏轼屡次冒死奏议，熙宁四年先后两次上书皇帝，自称“猖狂不逊，忤陛下多矣，不敢复望宽恩，俯伏引领，以待诛殛”¹。游本也承认，“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²。这就有些自相矛盾。苏轼不怕触怒皇上，不怕触犯皇族利益，又何怕触犯大地主阶级利益呢？另外，三十岁前苏轼虽大多生活在书斋中，但他决非闭门读书、食古不化的文人。他从小就有远大抱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追述：“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

¹ [宋]苏轼：《苏轼文集·再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751页。

²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2-53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如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¹苏轼为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²，“言必中当世之过”³。他考科举所写的《策略》，嘉祐八年写的《思治论》，变法初年的两次上皇帝书都表明他清楚认识到太平社会的危机，看到国家实际已面临内忧外患，对外“不为长久之计”，“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啖二虏”⁴；对内加重赋税，致使百姓赋税沉重，流离失所。他指出了吏治、财政、军备方面的各种弊端，主张“涤荡振刷，而卓然自所立”⁵。这里既可看出他“卓然自所立”的政治见识，也可看出他的策论是切中时弊，同样呼唤改革弊政的。而游本也承认“苏轼少年就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⁶，更何况苏轼在任地方官期间亲身感受到新法的种种弊端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从而写了大量的反对新法的诗，更说明他反对新法是从实际出发的。

苏轼反对新法却并未全盘否定新法。熙宁四年，他在变法初期的《上神宗皇帝书》中明确表示新法有其合理部分，他反对变法的关键是新法的急功近利。苏轼认为“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宦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

¹ [宋]苏辙：《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7页。

² [宋]苏辙：《苏辙集·〈历代论〉引》，中华书局1990年，第958页。

³ [宋]苏轼：《苏轼文集·晁公遡先生诗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第313页。

⁴ [宋]苏轼：《苏轼文集·策略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8页。

⁵ [宋]苏轼：《苏轼文集·策略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27页。

⁶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๕๗/๖ ฉบับที่ ๖ พุทธศักราช ๒๕๕๖

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并指出新法本身的弊端“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比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上糜帑廩，下夺农时，隄防一开，水失其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¹。苏轼清醒地看到了新法的弊端，他反对新法完全是从百姓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不惜冒死，反复上书，是他不忍坐视百姓受难，若等时间证明新法错误，“虽食议者肉，何补于民”，良知、责任感使他不顾一切。事实证明，苏轼在上皇帝书中指出的新法的种种弊端，在实施过程中都一一暴露出来。王安石变法用心虽好，但北宋积弊已久，不可能马上富国强兵，急功切利犹如揠苗助长，后患无穷。可皇帝、王安石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一意孤行，甚至排除异己，更使人心尽失，变法最终失败。

三、不同而并立思想：创文学奇绝之观

在变法初年反对新法者不乏其人，但能如苏轼直言犯颜，大胆坚持的却不多。苏轼在熙宁四年《再上皇帝书》说：“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或再失误，则知几之士，相率而逝矣。其皆如臣等辈，偷安怀禄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逊，忤陛下多矣，不敢复望宽恩，俯伏引领，以待诛殛。”²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被贬，八年而转任四处，甚至乌台诗案几乎丧命。他受尽挫折而矢志不改，本已令人感佩，更令人钦佩的是，新法失败，旧党上台，他本可以苦尽甘来，可他却又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并以自身经历现身说法，“臣

¹ [宋]苏轼：《苏轼文集·上神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731-733页。

² [宋]苏轼：《苏轼文集·再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86年，第751页。

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官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¹苏轼此举令很多人迷惑不解。多少新党小人恨不得此时摇身一变为旧党，而苏轼一直反对新法，受尽打击，几近致死，旧党上台，即使不打击报复，也该尽享胜利，他却能不计个人恩怨，客观评价新法；不计个人生死得失，犯颜直谏，并敢公然对皇上声称“虽赐诛戮，死且不朽”。正因为他认为自己坚持的是不朽的正道，才有如此的勇气和胆量。他此时肯定新法仍不是新法的全部，并非如游本所说“贬官黄州以后，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辟地耕种，有较多的机会接近下层人民，政治态度有所改变”，“多年地方官吏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的了解”。²事实上苏轼的观点始终没变，变法之初他承认新法有合理之处，变法失败他仍肯定新法的某些长处，只不过王安石、司马光都有“好同恶异”的世俗习气，不能容纳不同意见，缺少容人之量。苏轼没变，变的只是当政的人、实施的法。而苏轼为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³。他所谓的“难以处众”，其妾所云的“不合时宜”，其弟所说的“终不能悛”都表明了他不随波逐流、敢于坚持己见的品格。苏轼能超越当时大多数人的思维局限，不是非此即彼，将新旧之法完全对立。而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新旧之法可以不同而并立，这不仅仅是胸怀，更是远见卓识。

¹ [宋]苏轼：《苏轼文集·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791-793页。

²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2-53页。

³ [宋]苏轼：《苏轼文集·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834页

๖๗๖ ฉบับที่ ๖ พฤศศักราช ๒๕๕๖

苏门父子应举而不肯随俗为时文，苏洵因不通声律及第难于登天，他宁肯放弃功名而不改；苏轼、苏辙一举及第，名动朝野，是因有欧阳修慧眼，如没有倡导改革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苏轼会不会终生不第？“明代遗贤”历史上何其多。苏轼得遇欧阳修是他的幸，然而这份执著用于为官从政上，使他一生颠沛流离，在新党旧党倾轧中沉浮，却仍然“尽言无隐”，“不顾身害”。有见解，不盲从，坚持真理，置个人生死荣辱于不顾，屡遭贬谪仍尽心尽职为民谋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样的人品、官品及远见却没有赏识他的明君、贤相，又是他的不幸。幸与不幸却都没有改变他一生的做人的准则，这又尤其使人敬佩，也使他自傲无悔。他晚年被流放到海南，临死前一年遇赦，这时他作了一首诗，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总结，诗中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¹如果把“兹游”放大为他的一生，他一生的坎坷就是奇绝之观。这坎坷奇绝的人生是他一生无怨无悔的追求。

应该说一个人的文学成就是他一生内蕴才华见识的外在的综合显现。人生的奇绝之观，是创作文学奇绝之景的胸怀和底蕴。有了这种胸怀和底蕴，广纳博采的苏轼就能把前人的思想和学问融化消解，再造成自己体内的新鲜血液。他吸纳了儒、释、道各家思想于一体，但他有儒之执著，无儒之刻板；有道之潇洒，无道之消极；有佛之超然，无佛之虚无。这是一种包含着儒、释、道，又全然不是儒、释、道的苏轼独有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文学上他欣赏李白、杜甫、陶渊明，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但他绝不是小李白、小杜甫、小陶渊明，他是足可以与他们齐名并称的独一无二的苏轼。这正所谓“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袁枚：《随园诗话》）苏轼能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家，也正是他走过了从“有古人”

¹ [宋]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6页。

ปีที่ 6 ฉบับที่ 6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6

到“无古人”的历程，才见出苏轼之精神，才登上了文学的奇绝之峰，将“自是一家”的精彩之作呈现给了世人。